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政治基础：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刘同舫，张 乾^①

摘 要：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其为超越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和奠定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政治基础累积了必要条件。从历史语境来看，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的依据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性与长期性。无产阶级专政赋予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以双重要求，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表现为实现生产力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在国际关系建构方面呈现为和平发展与超越当下的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能够在满足国内社会发展需要、引领世界治理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彰显出政治制度创新和政治价值创造的建构意义，在实践中满足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内蕴的国内与国际双重需求，从而推进对政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探索，奠定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政治基础。

关键词：人类文明新形态；政治基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23)06-0001-07

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角度来解析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有利于把握中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政治基础，也有利于明确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历史必然。当前国内学界的研究多聚焦于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文明序列中的特殊性，主要形成以下两种代表性观点：一是基于文明线性发展的分析框架，将人类文明新形态归类于社会主义文明或共产主义文明；^①二是从文明多元并存的视角出发，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在当代的创新性发展，^②两种观点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整体性研究。笔者认为，不仅要探究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文明序列中的特殊性，而且还要分析人类文明新形态产生与发展的基础性构成。政治是指公共权力的分配与运用，国家治理体系作为规定公共权力分配与运用的体系性制度呈现^③是政治的重要载体，也是立于其之上的文明的政治基础。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扎根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历史语境，在逻辑上蕴含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内在需求，在实践中成长于中国对政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探索，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得以生成的政治基础。

一、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历史语境：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性与长期性

解析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历史语境是探究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前提。在阶级分析理论的视阈下，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④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双重

^①作者简介：刘同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博士；张乾，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浙江 杭州，310058）。

^②参见谢富胜，匡晓璐《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韩喜平，郝婧智《人类文明形态变革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4期。

^③参见左康华《从礼乐文明共同体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演进——文化学的视角》，《江淮论坛》2022年第5期；管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民族文化叙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化旨归》，《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9期。

^④参见薛澜，张帆，武沐瑶《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研究：回顾与前瞻》，《公共管理学报》2015年第3期。

^⑤毛泽东同志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这一思想仍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实现形式，人民民主专政在逻辑上包含于无产阶级专政，并非同无产阶级专政相并列（参见王伟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红旗文稿》2014年第18期）。

历史语境表现为：从历史一般的维度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消灭阶级存在的条件，具有社会形态嬗变意义上的过渡性；从历史具体的向度看，无产阶级专政的世界环境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共存，具有国际力量斗争和国内社会建设意义上的长期性。

以阶级分析理论把握人类历史是理解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性与长期性的理论起点。资产阶级思想家将人类社会形态的演变和国家治理的依据诉诸社会契约论，将商品经济内蕴的交换自由与主体平等原则上升为最高抽象准则，通过描述人类的“自然状态”将国家治理^①的合法性归因于人们基于平等原则所签订的契约，从而论证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永恒性。在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设想中，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基于这一所有制基础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竞争与敌对，是人类社会自然且永恒的状态，似乎“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② 马克思发现“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③ 以个人独立为特征的社会“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④ 资产阶级思想家构建起的“个人”，与其说是自然状态，不如说是成熟市民社会的市民。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不是源于独立、平等主体共同签订的承载共同意志的契约，而是产生于生产力发展带来的阶级分化。国家治理是为促使“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⑤ 而产生的缓和冲突、维持秩序且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基于阶级斗争的视野理解国家治理，能够在根本上摆脱“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永恒性”的理论旋涡，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仍处于阶级社会，隶属于阶级斗争的历史阶段，具有暂时性。

从历史一般维度看，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历史使命是在阶级斗争和政治统治中消灭阶级存在的条件以实现社会形态的嬗变，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其历史使命的治理原则，在推进社会形态嬗变的意义上，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呈现出过渡性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分工越细化，无产阶级在生产中与工具的差别越小，其生产与生存的“非人”状态越深刻。“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⑥ 资本和劳动之间也产生了更深层次的对立。物质条件和精神生活的双重压迫，促使无产阶级以革命的手段摧毁奴役自身的生产方式。无产阶级革命同以往各阶级的革命相比，具有巨大差异。以往各阶级的革命是将自己的身份颠倒，从被压迫者变为压迫者，以少数人获利的新阶级社会代替旧阶级社会，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是要结束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生产方式，以阶级社会的终结为革命目的，通过实现自身的解放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如何真正实现全人类解放的革命目的？首先，无产阶级需要摧毁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展现出强大生产力的社会化大生产实现全社会占有，将“绝大多数人”从阶级压迫中解放出来，建立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其次，共产主义社会建立之初“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⑦ 实现整个社会的新陈代谢需要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

①学界关于国家治理及其作用的探讨主要存在两种认知意向：一种是将国家治理视为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任何国家都具备的政治活动，是“在国家框架内对人的活动进行引导或规范社会行动的一整套实践”（张文喜：《政治哲学视阈中的国家治理之“道”》，《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另一种是在“统治—治理”的对比语境下使用，认为国家治理是对国家统治的扬弃，是多元利益的统一，只出现在现代国家中（参见燕继荣，何增科，叶庆丰《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对话》，《科学社会主义》2014年第1期）。笔者认为国家治理从形式上看是一种政治实践，其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存在，只是不同时期指导实践的理论和实践的具体形式有所不同，更倾向于在第一种意义上认识国家治理。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4页。

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将无产阶级的意志贯彻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新的所有制基础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实现集体财富的充分涌流和共产主义社会意识的塑造,从物质、精神层面消灭阶级存在的条件,列宁明确指出这一阶段“通常叫做社会主义”。^②从人类社会形态嬗变的历史进程来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形式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作扬弃对象,以共产主义社会为发展目标,致力于在消灭阶级存在条件的过程中消灭自身,具有过渡性。

从历史具体向度来看,由于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均衡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主义国家将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保持共存状态,无产阶级专政是保证社会主义属性的政治前提,具有国际力量斗争和社会建设意义上的长期性。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深入融合,少数垄断性银行出现,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争夺原料产地、资本输出和势力范围,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改变其以金融资本收割全球利益的本质,尽管出现了诸多新变化,并且披上“新自由主义”的“温情外衣”,但其仍处于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在加剧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同时,也固化了世界范围内不平衡的发展格局,即“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④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不平衡的发展方式既意味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够通过空间扩张缓解本国社会矛盾,也充分表明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具备历史机遇。20世纪以来,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从实践层面确证了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而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则表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斗争的复杂性与长期性。在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社会改良和转移国内矛盾而延续自身存在合法性的历史环境下,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性既是维持社会主义国家生命力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组织本国人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持续推进人类阶段性解放,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文明向前发展的政治保证。由于社会建设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只有长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通过行之有效的体制建设与凝神聚气的价值引领不断实现自身的全方位发展,创造出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成为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希望。

从历史语境看,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差异主要根源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性与长期性,过渡性彰显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目标的特殊,长期性蕴含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过程的特殊。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建立及之后一百多年里,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为了实现自身的历史使命对内创新国家制度设计,对外推进国际关系构建,展现出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这一进程中,一些国家遭受严重挫败,消亡于历史长河之中,另一些国家持续发展,展现出勃勃生机之势。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在成功与失败两幅图景背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究竟蕴含什么要求?

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内蕴的国内与国际要求

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理念与国家治理体制的综合,表现为“按照一定的治理理念确立起来,使国家能够顺利运行的体制机制”,^⑤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国家都拥有自己的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置于“传统—现代”的叙事语境中加以理解,指向农业国家治理体系向工业国家治理体系的转变。^⑥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治理原则,具有特殊的治理目标和治理过程,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蕴含国内与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5页。

②《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8页。

③《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34页。

④《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36页。

⑤辛向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个基本问题》,《理论探讨》2014年第2期。

⑥参见王浦劬《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1年第11期。

国际双重要求：对国内的治理要求实现生产力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对国际关系的建构要求实现和平发展与超越当下的辩证统一。

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超越。17世纪以来，西方资产阶级通过革命或改良的方式实现了政治解放，建构出一种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国家治理体系。这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本质是制度体系与制度理念的资本主义化，具体表现为经济服务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工业生产与市场交换，政治服务于资本家私人利益角逐过程中建构的自由与民主。马克思在承认政治解放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也指出“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① 政治解放虽然将国家从宗教束缚和封建专制中解放出来，将人从封建等级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它以资本增殖为根本诉求，塑造了国家内部各群体间新的不平等关系，固化了世界内部国家间不平等的格局。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既要求实现对封建国家治理体系的批判和对工业生产方式的适应，也追求将人从资本增殖逻辑中解放出来的治理目标，是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超越，具体表现在国内治理与国际关系建构两方面。

在国内治理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既要适应和推进生产力发展，也要适应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经由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的政治国家虽然“作为一个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② 但是其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③ 这一论断既体现资产阶级在掌握先进生产力基础上对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超越，也指出这种“超越”仅局限于资本增殖逻辑之内，无法充分释放社会化大生产内蕴的强大力量，只能以周期性经济危机缓解内在深层次治理矛盾。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同样追求对工业生产方式的适应，但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力求超越资本增殖逻辑，积极主动地调整生产关系，充分释放社会化大生产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不仅需要通过扬弃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扬弃以破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产力的束缚，而且需要消解资本增殖逻辑下物的力量对人的异化，在生产力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双重维度中，“向全世界国家与人民展现出其全面超越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前景”。^④ 苏联的历史为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提供了历史资源。苏联时期，斯大林模式是对传统沙皇俄国治理体系的超越，否定了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国家所提供方案的唯一性，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次伟大尝试。这种现代化在前期取得辉煌成就，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之一，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世界和平作出了卓越贡献。但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苏联党内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因教条主义和脱离群众而无法精准定位苏联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丧失了引导和满足苏联人民需求的能力。强大的社会生产力与相对匮乏的个人发展之间的错位加深了苏联人民意识形态的混乱，在西方的和平演变之下，进一步导致苏联人民对苏联的国家治理产生消极甚至是否定的态度。通过对苏联历史的反思，我们能够从经验事实中发现，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如果不能在追求生产力进步的同时充分服务于人的发展，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将被中断。

在国家关系建构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在妥善处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复杂关系的基础上，以全人类解放为价值导向引导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构。世界范围内各民族与国家之间的普遍交往是伴随世界市场的形成而逐步建立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⑤ 在这一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迥异于自身的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相处，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苏联的历史上，列宁和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4页。

④刘同舫《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5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斯大林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列宁面对国内生产力低下、无产阶级政党缺乏经济工作经验的社会现实状况,提出实施新经济政策,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经济联系,通过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经验,促使“工业能满足农民的需要,使农民能通过商业满足自己的需要”^①但也同时强调这种学习绝不是意在复辟资本主义,而是为取得最终的胜利而采取的迂回策略。斯大林也提出过相似的理论“在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在一个或几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之前,苏维埃俄国和我们这个领导它的党就不得不寻求同敌视我们的西方资本家集团建立经济合作的形式和方法,以便取得必需的技术装备。”^②根据列宁和斯大林的论述,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相处也好,战争敌对也罢,都是立足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需要所进行的策略调整,和平与战争都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社会主义国家除了需要处理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其国际关系的建构还需要超越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从苏联的历史看,受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打压和封锁,也禁锢于两大阵营冷战的意识形态,20世纪50年代之后,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全人类解放的根本价值导向。一方面,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中断了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深层互动;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建构了不公正不合理的内部秩序,使得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遭受不平等的对待。对全人类解放价值导向的背离,使得苏联的治理体系现代化逐渐丧失世界历史属性,在自身的封闭发展中走向绝路。

理解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蕴含的国内与国际要求,有助于我们从本质上把握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同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联系与区别。把握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双重要求,不仅需要遵循从“具体”到“抽象”的原则,更需要进一步从“抽象”到“具体”。在马克思看来,“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双重要求只有在现实中得到满足,才能展现其“改造世界”的能力,真正转变为历史实然。

三、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探索

国家治理体系集中表现国家政治文明的程度,治理体系的进步意味着政治文明的发展。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隶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的创新,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蕴含的国内与国际双重需求实现持续性满足,从制度建构和价值理念两个层面对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进行了伟大探索。

政治文明形态新与旧的衡量,需要基于政治文明的演变历史进行对比性探索。经济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而政治文明的变革又必然以新的上层建筑的建立为标志,因此政治文明的根基同样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即“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⑤有学者认为,政治文明“包括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⑥其中制度架构是政治文明的外在展现形式,价值建构是政治文明的内在理念支撑。从政治文明对经济基础的依附性特征来看,能否以新的政治制度满足经济基础的发展与变革是判断政治文明新与旧的重要标准;从政治文明的内在结构看,能否以新的政治价值理念超越旧的政治价值理念是判断政治文明进步与否的重要指标。中国的治理体系现代化能够通过政治制度和政治价

①《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4页。

②《斯大林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页。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9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⑥虞崇胜《政治文明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3页。

值的创新,不断适应并促进中国的生产力与人的全面发展,持续融入并引领世界秩序的变革,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在国内治理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创新和“人民至上”的价值创造,使得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①成功推进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创新在程序上涵盖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等国家治理的全部环节,在实质上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终旨归,促使政策制定者和政策执行者“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②与西方民主制度相比,“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被赋予了更具实质意义的价值内涵,因而具有比西方民主模式更高的制度上限”。^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新时代,在国际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国内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以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政策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带领中国人民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生活得到全方位的提升。当然,这一伟大成就离不开先辈人的努力,正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立足于人民立场,将人民民主制度转化为实际治理成效,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不断提升,从一穷二白到今天全面小康的建成,再到未来共同富裕的实现。

“人民至上”的价值创造源于中国共产党对“群众史观”的坚持。“群众史观”认识到人们是“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④强调历史的发展动力植根于“现实的人”所进行的“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⑤而非以往思想家所谓的少数人的“杰出创造”或绝对精神的现实展开。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以“民主”和“自由”两大核心价值标榜自己,然而,所谓的“民主”实则是资本家相互博弈的谈判,所谓的“自由”也只是资本生产要素对束缚的挣脱。作为社会大多数的底层民众只有流程式的投票自由和民主,并没有获得能够解放和发展自身的真实自由与民主。脱离人的现实性,将基于复杂社会关系产生的多层次利益诉求抽象为某种单一价值口号,是资本对人民心智的愚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始终从人的现实性出发,以“人民至上”的价值创造积极回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现实的人”的多阶段、多层次诉求。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彰显“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中,开展对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探索,这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那些既希望快速发展又希望保持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在国际治理方面,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治理理念,提倡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体系取代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主导的“全球统治”体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化与合理化。面对现存国际治理体系的内部矛盾与外在冲突,中国共产党以凝聚共同价值和实现共同利益为价值诉求,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探索出一种新的人类政治文明形态。

就凝聚价值共识而言,中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是对西方国家磨灭文明多样性的普世价值的真正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普世价值为舆论武器,将西方现代性理念作为解释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唯一依据,强制诱使后发国家遵循其现代性模板,从而在时间维度上建立起对后发国家的制度优势,加剧全球发展的不平衡性。与普世价值不同,中国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求同存异,寻找最大公约数,尊重各国人民的道路选择,有利于弱化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在凝聚价值共识的过程中促进人类团结。倡导价值共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23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38页。

③李洋《全过程人民民主内涵的多维展开》,《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4期。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识,既表现出中国对世界和平的向往,也表达了中国对发展人类共同利益的希望。

就塑造国际秩序而言,无论是已经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是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都反映出中国正在为世界治理体系提供蕴含中国智慧的全新方案。世界历史的展开以世界各民族间的普遍交往为标志,普遍交往伴随世界市场的开辟而不断深化。资本增殖逻辑主导下世界市场的开辟,是强国掠夺弱国的过程,当今世界东西差异、南北差异正是源于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的掠夺、殖民、战争和打压。尽管今天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但背后仍然潜藏政治霸权、经济霸权乃至文化霸权,这些霸权不断压缩发展中国家的生存空间,直白或隐晦地剥夺落后国家的发展权利,越来越多的国家渴望打破旧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建立更加公正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传统世界秩序的冲击,既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代表世界秩序发展的新方向,对处理全球重大议题具有方法论层面的指导意义,有利于在谋求世界和平发展与超越当下世界秩序的辩证统一中实现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探索。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选择,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要政治基础。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性与长期性在历史进程中的统一,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在国内与国际双重维度上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国的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新型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实践中通过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的创新,不断适应并促进中国的生产力与人的发展,持续融入并引领世界秩序的变革,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蕴含中国政治文明的根脉,汲取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精华,继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积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实践的伟大探索,将为各国的现代化选择和世界的整体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a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LIU Tongfang , ZHANG Qian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is the modernization of a new type of socialist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that surpasses the capitalist political culture, as such it paves the wa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Viewed historically,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of socialist countries is based on the transitional and long-term nature of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requires socialist countries to modernize their national governance, which in socialist countries is embodied in the unity of advance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and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embodied in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transcendence from the present.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PC satisfies China's domestic needs for social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and leads the governance reform of the world on the other, and is significant in innovating political systems and creating new political value. In practice, it caters to the needs of socialist countries to modernize themselves and responds to international challenges,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for the world to explore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lay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for such exploration.

Keywords: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Political bas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Modernize

(责任编辑 廖国强)